



海南现存 金石铭文研究

李长青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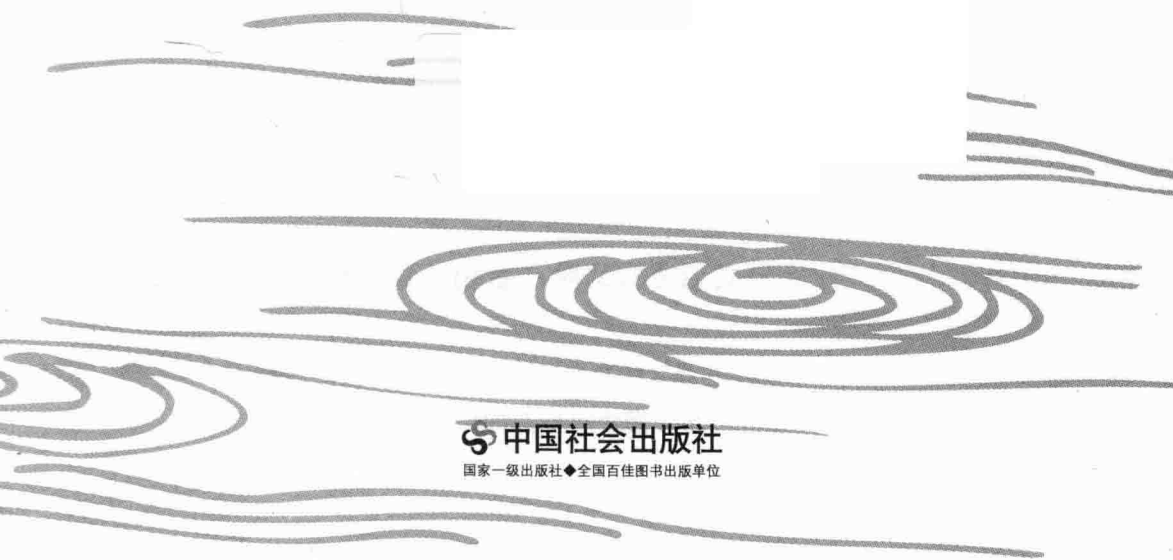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09年规划课题 (HNSK09 - 27)

海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海南历史文化与黎族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海南现存 金石铭文研究

李长青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南现存金石铭文研究 / 李长青著.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087 - 3732 - 4

I. ①海… II. ①李… III. ①金石 - 研究 - 海南省 IV. ①K87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7775 号

书 名: 海南现存金石铭文研究

著 者: 李长青

责任编辑: 向 飞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66026806

销售部: (010)66080300 (010)66085300

(010)66083600 (010)66051713(传真)

邮购部: (010)660810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保定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 / 16

印 张: 1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序

周伟民

长青是我的忘年交。多年以来,我都是直呼他的大名;他也认为这样更有亲切感。

长青这次出国后,由他夫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闫金玲副院长送来他的近著《海南现存金石铭文研究》书稿索序。通读之后,深深钦佩他对历史把握的准确和分析碑文时的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无疑,这是一部以碑证史、深具学术价值的学术论著。

这部书稿有许多优点,而让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在内容方面结构出海南岛的历史场景、在学风上严谨而又准确和在学术方法上的多种方法并用。

先说内容。著者依据所用的碑刻材料,参照史志记载和其他资料,结构出海南岛历史的大体框架;这个框架分别从文化教育、黎汉关系、信仰崇拜和世俗生活四个方面加以构建和论证。

这部专著,在内容方面有别于其他史学著作的最为显著的特色,不在于所结构出来的历史框架,而是让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即作者所构建出来的海南岛的历史场景。这方面体现在该著中,就是把所用到的每一块碑刻中所记载的事件和人物,清理清楚,于是就逐渐地显现出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读者能看到当时的场景,看到当时的自然与社会,即看到了当时历史舞台上活生生的人,并将这些人的思路和想法揭示出来,综合到一起,组成了历史场景;如果这个场景是细碎而有空白,则将史志中前人记录的东西作为线索来拼合细碎或者是作为填充物来填充空缺。

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将当时海南地方社会中的各种活动、社会组织状况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的表现,都叙述出来,让历史具有鲜活的“地点感”。第二,这些场景,将解读与刻文中材料紧密结合和相互互动,调动读者的想象和联想,联结起现在与过去,历史事实显得真切,读者在心智和情感上产生对历史的“临即感”,有“身临其境”的内心体会。

这就是我说的回到历史现场。

该著中这类叙述的例证很多,随手检出苏轼贬儋的碑刻为例。时代最早的应该是现存于东坡书院的《桄榔庵碑》,结合苏轼的《桄榔庵铭》,这是宋代碑刻;而最为珍贵的是元代仁宗年间范梈所立的《东坡先生祠记》,后来明代万历八年舒大猷《祭东坡先生文》。清代康熙十年《重修苏公祠记》,康熙四十五年又有《重建桄榔庵记》碑,道光时又有《重建东坡井序》。所有这些刻石,都说明一点,苏轼当时被逐出官舍后,当地黎民帮助他建立了这座干栏式的桄榔庵。这些刻石能看到这座桄榔庵大概的情形,若干木桩埋入地里,再用石头堆积加固,屋顶由树叶铺盖而成,所有这些材料和搭建都出自纯天然和手工,全部栋宇,“不烦斤鋸”;采光很好,白天能看见太阳,夜晚见得到月亮,通风也很讲究,而且还妙用天然,“风雨扫除”。但也有不足,常受海上雾障的困扰,尤其是海风强劲的时候,此外,基本是开放的,“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堂奥,杂处童奴”,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很显然,桄榔庵是典型的黎族式草房,对苏轼而言,简陋而艰苦,但他却苦中作乐,心态还是平和的。

这就活脱脱地将苏轼贬儋的心路历程表现出来,也让读者产生了到历史场景的感受。

次说学风。学风,这是定指治学时的作风。

长青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学科本身要求的是严谨和精确!

读史志不易,读碑刻则更难!长青的古汉语修养对他在阅读碑文时,理解文言文、古今习俗传统不同、字迹书写的不同形体、断句、靠现代工具书难以识读的字、文字异体、通假现象等很专业的问题提供了便利,体现在本著中固然就是能够很精确地把握碑刻的内容;但更为本质的是专著中所表现的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现存海南碑刻中所存在的问题,一般审读时往往忽略过去,但长青以他一贯的严谨学风,一丝不苟,发现问题,剔出毛病。例如,现在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雅蔡村梁关门梁云龙墓地,墓碑立于清道光二十八年。

从碑文中墓主人的头衔看,墓主人应当是明代高级官员,明确写出是“明赐进士任湖广军门兵部尚书左侍郎”。立碑人署名“长男某某”、“次男某某”、“侄某某”、“孙某某”等,但立碑时间却在道光二十八年。这显然时间对不上。可能的解释是,原碑已毁,此碑为后人复刻重立,但未注明复刻重立。碑文未说明。

另一个例证是现存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博洽村土地庙旁的一块墓碑的碑文,立碑时间在清道光十五年。立碑人对墓主人的称谓有令人思索之处。立碑人署名“孙某某”、“曾孙某某”,显然墓主人是其祖母、曾祖母,但墓主人的头衔却是“清吴明璠公发妻李氏婆”,这与海南岛现存墓碑中,晚辈立碑人对墓主人一般称“某某考某某”、“某某妣某某”等明显不同,在墓主人头衔中回避了立碑人自己与墓主人的血缘亲属关系,其中缘由何在?值得探究。

还要举一个例证。

位于同一地点的吴兰心夫妇合葬墓碑碑文,立碑时间在民国十八年,文中立碑人就对墓主人称“某某考某某”、“某某妣某某”,合乎一般惯例,但这块碑也有疑点,即在墓主人头衔前加上了“汉族”二字。考虑到当时是1929年,怎么会有“汉族”二字的头衔?

上面例证,或是时间、或是称谓、或是演文的显著毛病。下面的例证则是细加分析才能发现问题的。

长青把现藏海口市博物馆的两块南宋绍兴十九年冥宅地契砖作典型进行分析。指出,这两块冥宅地契砖属于同一位墓主,在今天看来,这两块冥宅地契砖是当时丧葬仪式中道士作法的法器,是用来向冥界宣示冥宅所占土地权属和安置墓主亡魂的,其内容格式基本类似于普通房地交易契约;两块砖的刻文对墓主周一娘的亡故采用了不同的描述辞语,前一块说“因往南山采花,踏而不返”,所以买地安宅,这应该是在墓主下葬之前,开掘墓穴时所为,就坟墓来说,仅仅是土木施工,还未与墓主发生直接关系,而直接面对的神仙是东主公、西王母,说“南山采花,踏而不返”,是为了美化墓主的亡故,不致引发神仙的反感,以利西方接引;后一块说“因白鬼散松,门兔归蒿里”,则应该是下葬时所为,此时即“蒿里”“安尸”,为了避免墓主亡灵回返,招致不利,在辞语书写中还进行了有意识的避讳,把“魄”写成“白鬼”,把“閼”写成“门兔”,并要求“保人松门见人蒿里安尸,后不得拒违”,以求亡魂彻底归于冥间,而再不与阳间有干,有安定和镇住亡魂的意味,显然,这是惧怕鬼魂作祟而求墓主魂灵得安的传统意识和做法。

这里的“閱”，当读为逸，意思就是“逸”，在砖上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门写作“門”，而“兔”则进行了笔画变形，起始两笔写成类似“鬼”字的起始几笔，并把“閱”字“門”内之“兌”写成“兔”，尤其凸显最后一“丶”，是为了凸显“閱”字专用于鬼魂，以便区别神仙飘逸之“逸”和亡魂“閱归”之“閱”；这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鬼神之别及其在汉字文化领域内的表现，也因为这个原因，“閱”和“逸”在书面语中成了分别用于亡魂和神仙的两个词，而从现代词汇学的角度说，就是同一个词“逸”，由此也能看到，汉字对汉语言的影响非常复杂，远非基于西方语言学基础上的文字观念所能解释的。

诸如此类，足证长青的严谨学风。

三说方法。这部专著是多种学术方法并用。因为在说明不同问题时举证的例子用不同的学术方法解读，有不同的效果。

首先是对碑文内容举出多种文献互证。例如，昌江县石碌镇水头村收存的乾隆四十七年《禁采石碌》碑，反映了官府为权益而自己发文维权的事。文告中说今石碌矿山，有铜矿出产，而铜在当时属于铸造钱币的贵重金属，所以当时昌化县有私人出资雇工开采金牛岭（今昌江县水头村附近）铜矿，但不幸发生矿坑崩塌，压死多人，引起当地人士抗议，随即停止采掘，官府在水头村刻石严禁私自采挖，即此《禁采石碌》碑。从文告中看，当时偷采石碌铜矿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严重程度如何？文告中没有说明。长青举证了刘耀荃编《黎族历史纪念辑要》中的记载，到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及光绪年间都曾开采。1974年12月21日，海南铁矿曾在石碌北一主矿体412米水平电铲作业时，从有铜矿处挖掘出留长辫子的干尸两具、三角铁耙两把，据考证是清代工人挖铜矿时被埋没的。又举1985年，儋县文化局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海头区老市发现清代炼铜遗址。当时从老市到石碌途中，每距20千米就设一个站，以接应挑矿石的挑夫。所炼出的铜用船从海头港运出岛。

这样就说明白了文告所说的内容。

其次是对单篇碑文进行深入的分析。

对现存三亚市羊栏镇回辉村清真寺的乾隆十八年《正堂禁碑》所记录的由海面而引发的官司，著者分析说，碑文中所谓“蛋户”就是“置户”，传统上以船为家，居于水上，以捕鱼、水上运输为生，这篇文告就是置户徐翰邦等与当地回族居民发生纠葛后提起诉讼所作的裁定；从文告中能看到，当时渔民捕鱼生产有较为严格的管

理,一是限定海区,但并未明确划界,二是要获得批准,三要缴纳课税,四禁止出界捕捞,为此禁止多买米粮,五不禁止外地渔民到此捕捞,但要申请许可,并照章纳税;另一方面能看到,当时疍户与三亚回族居民有分别归属于自己的海域,双方也承担相应的税赋,具体数据记录在文告中,由数据看,税赋对于疍户徐翰邛等确实过重,官府也认可这一点,但却以历史旧制为理由而维持不变,这个判决对于疍户而言是不公正的,这正是引发此次诉讼的原因,在文告中也能看到在打官司之前常有疍户越界捕捞的情况,双方曾发生过较为激烈的纠纷。

疍户传统上在陆地上没有土地、房屋等资产,这就是疍户与其他人群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区别,由此也形成了疍户自己的一些风俗传统,例如不与陆地居民通婚、独特的头饰、自己的禁忌体系等,此外明代邝露《赤雅》卷上明确记载:“疍人神宫,画蛇以祭。”他们在历代都属于被歧视的族群,唐代强迫他们交纳人头税,宋代禁止他们上岸陆居,不准和岸上人通婚,清代甚至规定昼家不得与平民同列甲户,被编入“另册”。由此,这篇乾隆十八年《正堂禁碑》文告之所以会对疍户显失公允,也就可以理解了。

此外,从这篇文告中还可以看到三亚回族居民在清代的生产、生活和环境等状况。

经过这样简明扼要的分析,读者对此碑的意义和价值就有了全面的认识。

再次,是将同类碑刻联系起来分析。例如对某些比较复杂的碑,除了记载墓主、立碑人等情况外,还会有墓志铭,如果内容特别复杂,那么墓碑就不止一块,而是一组,这类墓碑群组中,著者举出比较有代表性的现存三亚市崖城的何秉礼墓墓碑群组,该墓碑群组共有碑刻五块,分别由生前好友、地方官员、相关同事及门生弟子等刻立;与那些相对简单的墓碑相比较,这一类墓碑群组一般都会有墓志铭,何秉礼的墓志铭就由他的生前好友吉大文书写的。

大体相同情况的还有现存于安定县博物馆的清嘉庆二十五年《皇清诰授奉直大夫直隶滦州知州君暨德配林宜人合葬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记载了墓主莫谟及妻林宜人的生平事迹,包括家世、官历政绩、典范事件、后代世系等情况,由于这是所谓丛帖碑,即由若干块碑合租而成的碑刻群,这类碑刻群,联系起来分析,内容和价值显而易见。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有创意的海南地方文献研究的学术新收获。

学术评价就说这些。临了,还想就这部专著的资料来源交代几句。因为知识产

权问题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包括出版界有所忽视的问题;近年,风气才略有转变。

我必须替长青说明的是,这部书所据以立论的碑刻,共有八十四通之多,其中有两通说明出处,出自《海南金石概论》,另有少数是出自海南地方志或在网上查得,而绝大多数是出自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编印的《海南现存碑碣匾铭额图志》的书稿。这部多卷本“图志”因故未能正式出版。

“图志”是2006年7日启动的,时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同志亲自主持,先后召开过全省各市县宣传文体部门的领导开会专题研究。各市县都派出了人员负责对所在市县内为碑、碣、匾、铭、额做拉网式调查并认真做拓片、拍照片。有些市县先后做了三年才完成。

全省的稿件集中后,先后聘请海大、海师文史方面资深教师断句、校对,后由专家作了一审。在二审时,曾经请长青审阅了海口市的美兰区、龙华区和琼山区等区的稿件。专家们审稿过程中,在省委宣传部统一安排下,由詹长智同志带领唐玲玲、邓玲和笔者四人到全省(除三沙群岛外)各市县逐项逐项进行复核、补正。

长青的书稿,多是据“图志”稿本将海口市部分区的碑文、拓片挑选出所需的碑刻进行论述的。

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图志”并未出版,而长青也并未说明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做田野工作的收获。如果由此而引起知识产权的争端,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因此我在这里郑重地替长青作说明。

前言

海南岛位于我国陆地领土的南端,是我国的第二大岛,地理位置在东经 108 度 37 分到 111 度 05 分之间和北纬 18 度 30 分到 20 度 18 分之间,地处亚热带,陆地总面积 35354 平方千米,森林面积 1714700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51%;南面中国南海,北面与广东省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相望,该海峡宽约 18 海里。

海南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与生俱来的边疆属性,其边疆属性中最突出的特性就是边远。

这首先体现在地理空间上,从我国现在的地理中心区域陕西关中到海南岛海口市,乘坐民航客机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多,大约是两千多公里,这是现代交通技术条件下的概念,倒退一百年,这个距离是一般人几乎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在三亚的下马岭,才会有《天涯》和《海角》的摩崖石刻,在当时人们的概念中,这就是天边,是世界的边缘。

海南岛的边远其次体现在时间上,历代犯官被贬到海南岛及海南士子赴京参加科考,从其起程开始到实际到达,一般来说,路途上的时间最少都在半年以上,唐李德裕《登崖州城作》诗云:“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鸟飞犹是半年程”,虽有夸张,倒也不算过分。

海南岛的边远还体现在文化上,由于琼州海峡的天然隔断,汉代以前,中原地区的人们实际上并不确切知道有海南岛,中原文化当时影响最远到达现今的雷州半岛一带;作为中原文化概念中的蛮荒之地,汉武帝在元封元年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海南岛始纳入中国版图,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到汉元帝初元三年(前 46 年)即下诏罢珠崖郡,之后一直到隋冼夫人时期以前,都没有接受过中央政府持续

不断地直接而有效的治理,从唐代开始,这种文化上的隔膜才逐渐被切实消除。

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南岛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蛮荒之地,人类在海南岛的存在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万年前,从那时起,到《禹贡》所书写的时代,凭借着岛上的自然资源和持续不断的努力进取,独立自主地形成了《禹贡》中以“卉服”、“织贝”为特征的岛夷文化,这种状况可能一直保持到冼夫人招抚儋耳千余峒时,之后则逐渐演变为现今的黎族文化。

岛夷文化是最原始意义上的海南岛文化,是基于海南岛自身自然生态条件与环境的,命名源于《禹贡》中的“岛夷卉服”,基本特点就是前面说过的“卉服”、“织贝”,此外还有断发、文身、儋耳、凿齿等,这是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海南岛本土文化。

相对于岛夷和岛夷文化,从汉武帝时代开始逐渐进入海南岛的内陆人员,是不折不扣的外来移民,他们从中原地区出发,翻越五岭,到达岭南,再从雷州半岛登船,跨越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很长,经历的曲折很多,付出的代价极大,最后到达的地方,是中原文化概念中蛮荒的不毛之地,这个过程和结果对移民造成的心理、精神影响极大,形成了属于他们并延及后人的移民属性,影响着他们在海南岛的各个方面。

这一移民属性,首先体现在精神、心理上,自然环境的恶劣,文化环境的荒芜,社会环境的争斗,对他们而言,必然在心理上产生巨大的震撼,影响到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对现实的认知和对未来的期待,进而产生相对负面的精神、心理状态,唐相李德裕遭贬后的诗文充分表现出了这方面的特征;移民属性还体现在行为方式上,面对陌生而恶劣的现实环境,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生存,在很多时候,生存甚至是第一要务,为此不得不忍耐在正常状态下无法忍耐的东西,表现为异乎寻常的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善于抓住一切可能带来希望的东西,而这种行为一旦形成习惯,就会转化为麻木和迟钝,还会有某些短视和愚昧,贪图眼前利益,进而在之后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显示出自己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这是在考察海南岛历史时,必须注意的人的因素。

中原移民的到来,给双方都提出了新问题,即如何与异文化打交道,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双方都在努力寻找答案,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最终的定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是一目了然的:

第一点,在岛夷文化和后来的黎族文化中,中原汉文化的成分越来越多,同时

岛夷文化、黎族文化也大量渗入中原移民的汉文化中,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海南岛本土特色的地方文化,这一点可以看看道教在海南的本土化特点。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而从清代后期开始,则是近、现代文化的成分越来越多。

第二点,岛夷文化和之后的黎族文化,始终没有发展到具有系统而全面的社会组织结构的阶段,更没有形成整个文化体系一致公认与服从,并贯穿始终的社会组织结构核心;这并不是说在岛夷文化、黎族文化中没有过社会组织结构核心,事实上在历史进程中,由于梁、陈、隋、唐时冼夫人及冯冼氏家族的崛起,曾经一度有过具有高度权威的社会组织结构核心,但这只存在于较短的历史时期,黎族文化在其整个的历史演进中,其社会组织结构总体上是以分散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为基本形态的。

由于岛夷文化和后来的黎族文化的存在,随着中原移民到来的中原文化,必然会与岛夷文化和后来的黎族文化发生关系,出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理解和融合,这是海南岛历史的一条中心主线,贯穿始终。

海南岛文化的发展演变始终受到内陆中原地区的影响,因此在时间上呈现出跳跃性特点,汉武帝置珠崖、儋耳两郡是第一次跳跃,之后差不多沉寂到隋朝之前冼夫人时代,唐宋时代是又一次跳跃,大批的贵族名流被贬到海南岛,直接促进了海南岛文化的跃进,明代是第三次跳跃,儒学科举教育大获成功,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丘濬、海瑞,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进程。简要回顾一下就能看到,每一次跳跃都会使海南岛文化发生一次嬗变,上一个大台阶,前两次跳跃是海南岛文化对海南岛外内陆文化的被动接纳,第三次跳跃则对海南岛外的内陆文化作出了回馈,产生了影响。

海南岛文化的发展在时间上的跳跃性特点,本质是其在时间上的分布不均衡,这一不均衡也体现在空间上,基本表现为沿海低海拔地区的发展程度高于岛内中心的高海拔地区,并且随着海拔的增加而加剧。

观察海南岛的文化和历史,上述几个方面是基本的背景,也是本书立论的基本背景。

从汉武帝设置珠崖、儋耳二郡开始,海南岛的历史、文化发展就产生了大量的实物、文献,但由于自然环境与人为因素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文字材料,主要还是以石碑、摩崖石刻等为主的石质文献,其他还有分布于岛内各处的木质匾额、楹联等;与这些非金属器物、文献相比,金属器物、文献则相对比较少,这是由于

金属器物制作不易,海南岛古代历史上除出产少量铜以外,绝大多数金属及其制成品大都来自内陆,成本高昂,加之自然环境造成保存不易,从而限制了金属器物的历史存量,所见寥寥,不足以论,有鉴于此,本书将主要讨论刻石文献。

2006年,由时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同志主持,开始了大型多卷本文献《海南现存碑碣匾铭额图志》的编纂,作为前期基础工作,动员了全省各市县相关部门和人员,对海南现存的各类石、木、金质器物、文献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清理,查明海南现存碑、碣、匾、铭、额数量约1800有余,并形成了相当数量规模的拓片、照片;在这项规模浩大,意义非凡的文化建设工程中,笔者有幸参与其中,接触了大量文献拓片、照片,并二审校阅了其中部分誊写稿本,在这一过程中,感慨良多,觉得有必要深入探寻一下,为海南岛的历史、文化传承做一点儿事,于是就利用参与之便,以《海南现存碑碣匾铭额图志》所收存的部分碑刻为基础,结合史志,匆匆草就四章,主旨在于力图以此种方式粗线条地勾勒出海南岛历史的几个场景,从而在海南岛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方面探索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条新的认识路径,希望能以此就教于大方之家。

海南现存的这些石、木质文献,形成于宋元明清各代,其语言、文字、辞章格式等多不同于现代,又有囿于书写、凿刻工具而形成的笔画省简、文字殊形,加之器物残破、磨损,某些刻石字迹漫漶,几不可识,笔者于识读中多遇繁难,苦思中偶得琐屑,于是择其粗要,草成《浅说金石刻文的识读》,列于四章之前,初学或得免覆辙,更盼大家玉振。

周伟民、唐玲玲两位前辈方家,学识渊远厚重,造诣广博精深,于后学悉心提携,问则有答,倾囊相授,所获实多,素为学人景仰;区区在下,赧然索序,期愿圣泽被,竟获慨然华章,不吝溢美,笔者虽愚陋,亦知前辈爱护提携期许深意,感动惶恐之余,自当奋力,不敢懈怠,以为感谢。

浅说金石刻文的识读

金石碑刻铭文的识读,古人与今人都有困难,这些困难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相同的困难是,都要面对碑体器物的磨损、残破和字迹的漫漶不清,如果这些情况比较严重,就可能导致无法识读;不同的困难是,今人所面对的刻文,其语言大多是文言,少数是古白话,在文字、词汇、语法和行文格式上与现代多有不同,这个困难对古人而言是可以忽略的,而对现代人则是大问题;此外还有习俗传统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今人识读金石刻文比古人更困难,这就要求现代识读者具备一定的古代汉语知识和能力,特别是要熟悉繁体字,这是不言而喻的。

以海口龙华区龙泉镇翰香小学旁翰香坊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奉府给示》碑为例,简要说明一下金石碑刻的识读。后面那张图片就是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翰香坊现存的道光二十五年《奉县给示》碑拓片照片。

除了最上方碑题“奉县给示”和最左侧“道光二十五年岁乙巳腊月吉日合众仝立”的款识外,全部碑文分两部分,“禁规条例”四字以上是当时琼州知府为发布这一条例所写的公文告示,“禁规条例”及其下面的部分,就是所发布的条例本身。

就这块碑刻来说,保存的状态不错,字迹清晰可见,识读还是比较容易的,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是文字。在上半部分公文告示的右起第二列“拜会”的“拜”写为;第三列第二个字“睹”写为“覩”,第四列最后一个字“妄”写为“𡗗”,第六列中间的“葬”写为“𡥉”,第八列中间“纠”写为“糾”、“辈”写为“𡥉”、“覆载”的“覆”写为“𡥉”、“所”有两种写法“𡥉”和所、第九列的“图”写为“圖”、第十列“尸骸”的“骸”写为“骸”、第十三列的“取”写为“取”;下半部分第九列“夜”写为“夜”、第十列“旧”写为“旧”。



如果识读这些字有问题,首选的解决办法就是查工具书,《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字最多的专业字典,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其余问题可以翻查《康熙字典》和有关的书法字典,因为其中有些字很显然是受到书写、凿刻工具与方法的限制,不得不在形体结构上加以调整,这样的字在一般的文字学字典里可能没有,但在书法字典里很可能存在,例如把“辈”写为“𨾏”、“骸”写为“𨾏”等;“覆”写为“𨾏”,用“伏”替换了“復”,这也是由于字体繁复而毛笔书写不易,更不易于凿刻,而被迫所为,这是非常明显的形声字中声符替代现象,只要具备相应的文字学知识,识别是很容易的;同一原因导致的字体改变还有“旧”写为“𨾏”,这个字比较特殊,由于“舊”字艹字头下面的部分难写难刻,所以要加以变异,按照常理应当写为“旧”,但却写成了

“𨾏”,在“旧”上面保留了“艹”字头,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汉字从繁体到简体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例证;“纠”写为“𨾏”,用“斗”取代了“丩”,从而使“纠”字的形声结构变成了“𨾏”字的会意结构,这是比较典型的异体字。

所有上面这些例字,都是同一个汉字的不同形体,符合广泛意义上异体字的特点,可以看作异体字;异体字又称为又体、或体,《说文解字》中称为重文,是指读音、意义相同,但写法不同的汉字。导致文字异体的原因比较复杂,在上面这块碑刻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由于书写和凿刻的原因造成的。

文字之外,还有断句,古人不用标点符号,他们从小就接触学习这样的语言范本,所以对于古代文人这不是问题,而对于今人就得学习掌握相应的句读知识和能力,此外还要凭借基本的逻辑关系和语序来加以判断,以这一篇刻文为例,“翰香坊众等目睹朝廷之法律心切乡里之禁条窃取其意以靖地方”这一句,其基本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人干什么,什么人即“翰香坊众等”,干什么即“目睹”“心切”“窃取”等,再把相应的动作对象即宾语和动作目的添加进去,全句的句读即昭然,于是这里的逻辑关系就体现为语序,即主语—谓语—宾语的结构;下来的几个“或……”句,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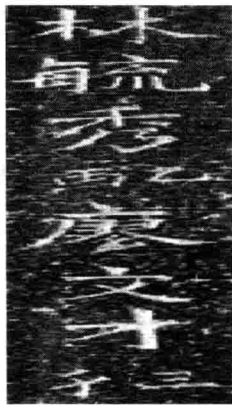
典型的排比结构,凭借“或”字即可断开,之后的句子里还有“至”、“甚”、“若夫”、“又”等辞语,都可以作为断句的依据,从而实现句读。这一篇刻文文辞简易,断句不难,但是断句所需要的知识却体现得十分突出,除了语序和语言逻辑关系外,还需要相应的修辞知识、句法结构知识等,这些方面的知识掌握了,断句就容易了。

这篇碑刻的前半部分是官府的文告,所以带有十分鲜明的官府公文特点,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特授琼州府正堂加三级记录三次爱为严禁迎神结盟拜会停棺借命诈财事”这一句,这实际是这篇官府文告的标题,句法结构是什么人为什么事,什么人是“特授琼州府正堂加三级记录三次爱”,“爱”就是这位知府大人的姓,由此可以推断他是旗人,“爱”前面的那些词语是爱大人的头衔,包括官职、级别和荣誉,什么事是“为严禁迎神结盟拜会停棺借命诈财事”,意思是说明白为什么事情发这篇公文,这种什么人为什么事的标题结构,在明清时代的官府文告中常见。

刻石公文不同于纸质公文,古代公文格式也不同于现代公文格式,就这一篇来说,限于石碑本身面积有限,不仅文辞连缀,而且没有必要的格式表述,除了两处空格外,基本是不加区别地一串到底,这更需要我们仔细判别。

在其他金石刻文中,还有其他一些文字问题,凭借现有工具书难以解决。

这些刻文中最常见的一个字符就是,该字符还有其他形体,如、等,从其所出现的上下文来看,应当是同一字符,例如右侧海口市永兴镇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纲纪四方·捐款题名》碑中题名图示下方横写的两个字;海口市长流镇咸丰九年《芳偕日新》碑则有如上面三图分别所示的三个例子,都是“帮 X 多少”的格式,这说明、、等,与这里的三个同类字符属于同类,据此判断应该是“钱”的意义,结合前面“林毓秀乙两”来看,“廖文才三”后的类字符应该是白银的计量单位“钱”;而在同一碑刻中还有其他的同类句式,但却分别写作“给钱六百文”、“帮钱五百文”、“帮钱三百文”等;此外,在海口市旧州镇清《宾兴捐资题名》碑的碑文中,钱、并用,姓名与捐资数额同列同行,所占空间相同,情况与此类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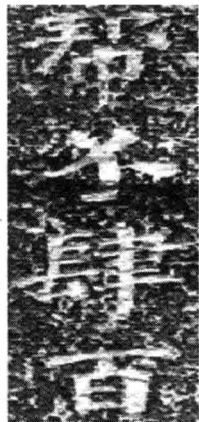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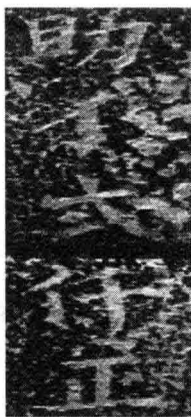


综合上述情况分析,即可得出结论,海南金石碑刻中的类字符就是钱字的代替符号,由于它既表示计量单位“钱”,也表示货币的“钱”,可以认定该字符具有文字的特征,可以认为它是“钱”字在广泛的经济货币意义上的异体,读音和意义都与

“钱”相同。

对这个字符,如果识读者具有一定的书法修养,特别是对于草书较为熟悉的话,那么前面的分析就完全可以省略了,因为这个字符是泉字的草书体;由于泉、钱之间,有文字学意义上的联系,所以这个字符在这里就是钱字。

海口市旧州镇咸丰六年《兴贤宾兴序》,有“愿畺之人士互相劝勉也”句,其“畺”作,如右图所示;海口市旧州镇光绪二十六年《文会宾兴续记》碑,有“俾本畺内被其泽”、“畺中未必人人”、“本畺仁护村”、“本畺龙佑村”等句,其畺或作,或作,或作,等等;海口市三门坡镇宣统二年《小学堂碑》碑文首句为“今将各圖捐题学额姓名开列于左每名钱拾仟文”,其圖作,另有乐育英畺、龙包屯畺等;此外,在其他碑刻铭文或传世纸质文献中也有类似于畺、圖、圖的文字,用以表述乡村中基层自然地理区划都、里、鄙之鄙,但多有以其为“图”字之例,窃以为不妥。



圖、圖、畺读为地图之“图”音时,即图画、图片之意,但作为自然地理区划单位,则应读为都鄙之“鄙”,其所指即为偏远郊野之地,与都市之“都”相对,而“畺”即“鄙”的本字;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字学理论的发展,以“畺”为基础,先后产生了“鄙”、“圖”、“圖”、“图”、“囙”等字,既表示都鄙之“鄙”,也表示地图之“图”,在前一个意义上,“鄙”、“圖”、“圖”、“图”、“囙”等字,都是“畺”字的异体字;而在简化之后,“圖”、“圖”都合而为“图”,进而间接影响到都鄙之“鄙”的“圖”、“圖”,人多识以为“图”,而不知有都鄙之“圖”、“圖”,对传统的自然地理区划文化造成一定的混乱和误解。此汉字简化之一不足也。

长流镇杜氏宗祠咸丰九年(1859年)《学田碑记》有句云“里之内同被教泽”,